



#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笔谈②

## 明清大同与万里茶道

宋志强

由晋商开拓并主导、沿线商民共同参与运转的中俄万里茶道，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持续兴盛，成为继丝绸之路后，沟通欧亚大陆的又一条国际商路。在万里茶道的形成和历史变迁过程中，作为晋商原始资本积累地、万里茶道必经之地和重要商埠，大同占据着独特而又重要的地位。晋商得益于明初“开中法”的崛起阶段、明中后期“蒙汉互市”的壮大发展阶段和清初“中俄条约”签署后的鼎盛阶段，这些都与明清大同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同见证了晋商由盐商、粮商到茶商的发展轨迹，以及称雄商界500余载的发达史。

明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农、牧区之间本没有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既利于不同民族之间互补交往，也容易产生对峙摩擦。以衣立国的明王朝，不仅无力控制北鄙辽阔草原，而且不得不随时应对蒙古骑兵南下劫掠。因此，“高筑墙”就成了明王朝贯行始终的基本国策。历久不断的“高筑墙”，致使人、财、物向北部九边防御线源源不断地集结，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蒙汉交界地区的开发，缩小了南北经济的差距。“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塞之所无者”。同时，“高筑墙”并没有真正中断蒙汉间的交往，或冲突，或朝贡，或马市，最后以“汉达兼利”的互市贸易方式结束。居于河东盐区、粮棉区和大同镇军事消费区、蒙汉贸易区之间的晋商，占尽政策和地缘优势，集粮商、盐商、茶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蒙汉互市贸易过程中，兴起了商界，继而成为开拓万里茶道的主力军。

### （一）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且关系国计民生，历来都是官府专营。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日益将食盐贸易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日益变得不可能。因此，宋代以来就有放开国家垄断，允许指定的官商进行经营的议论。明政府为解决“九边”八十多万驻军的粮饷供给，实施了军屯、民运粮制度。鉴于军需边粮的日益增加和运输困难，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行省上书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输运之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同意了这个招商输粮而与之盐引的“开中”之法。“盐法边计，相辅而行”，这个最早于大同镇推行的开中制一出，立收“转运省而边储充的效果”。其后，九边各仓，多招商中盐以为边储。开中制在大同镇的实施，几乎贯彻整个明代。

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初俺答汗为“顺义王”，结束了双方数十年的封闭对抗状态，大同镇边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作为“隆庆议和”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政府在大同等镇边重开马市，结束了明朝近两百年的朝贡贸易制度，大同地区的蒙汉贸易合法化、制度化和长期化，开启蒙蒙政治经

济关系新局面。大同镇边出现了“军民乐业，即唐虞之世”的安宁景象。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山西镇、大同镇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的边镇，宣、大二镇又是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以“极临边境”的优势，开中法一实施，山西商人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成就了一大批边商，边商又多为晋商。占据河东盐区、粮棉区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集粮、盐商于一身，在开中制的实施过程中，攫取了第一桶金，并兴起于商界。

随着弘治年间折色开中的实施，盐商分为仍然靠运粮换盐引的“边商”和在内地用银子换盐引的“内商”。“内商”兴起，边商“式微”，但晋商并没有因此而衰亡。一部分晋商又由边商转内商，举家南下江浙，并寓籍于两淮地方。如太原阎路楚的祖父和父亲，先纳粮报中于宣大边镇，换取盐引，后“以太原望族置淮上筑盐”，“举家迁居扬州”。明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山西商人寓居淮盐集散之地扬州，从事淮盐买卖，从中牟取利润。蒲州人王瑶，襄陵（今襄汾）人乔承统和高邦佐，洪洞人杨义，大同人李承式等，都是有史可查的在扬州发家致富的晋商及其后裔。据乾隆、同治《两淮盐法志》以及地方文献资料中记录有李承式、高邦佐等众多在扬州的山西商人及其子弟。这些山西商人及其步入仕途的子弟，均与淮盐经营有关。

另一部分晋商及时地由盐业转向与北部少数民族的多元化贸易，特别是隆庆和议为这部分晋商又提供了一个新机遇。“马市既开，官商云集，银货星罗”，为了开好马市，官方“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大同不仅是小商小贩的求生之地，也成为晋商大贾的云集之所。于是，山西商人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两淮盐区竞争激烈的市场，逐渐在自己原本就十分熟悉的沿边广大地区开辟了丝织、布匹、盐铁、粮食等行业的广阔市场。

隆庆和议之后，大同镇北边“战斗之民，转而趋南，烽燧之场变而殖禾黍”。同时，成为江南与蒙古区域交易市场的中间的大同镇，商业繁荣，市场扩大，为晋商大显身手提供了历史舞台。加之蒙古区域庞大的市场需求，成就了一批巨商富贾，“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晋商在“开中制”“互市”等政策的推动下，完成了晋蒙蒙交界区域重要商埠。正是由于有大同贡道和大同马市的存在，才使得明代后期大同商贸繁盛、客商云集，也使得晋商在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通过大同打开了对蒙古、俄罗斯的北路通道，从而打开了一条国际贸易大通道——万里茶道。作为通往“西口”或“东口”间重要的集散中

心，在17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300多年间，大同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枢纽性节点城市。

### （二）

处于桑干河上游的大同地区，有着深厚的黄土堆积和充足的日照，却又苦寒的气候，使得历史上农耕、驻牧两种经营方式曾经反复交替。只是到了明代，军屯导致长城边境内的大面积耕垦，出现以卫、所、城、堡为代表的新城址与聚落，才使得农业经营方式被稳定下来，再也没有逆转为以放牧经营为主要方式的生态环境。“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正因如此，清初，明朝的卫所制度并未马上废除，而是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管辖单位大约存在了80多年。随着大同镇长城沿线军事城堡职能的消失，先是裁撤边卫和卫所。后在雍正三年（1725），将天镇卫、阳高卫改为天镇县、阳高县；左云卫改为左云县。在这期间，卫所内部“民化”，“属地”行政化的过程加速。最终卫所转变成县城中心，屯堡裁撤，消亡或变为乡堡。明代大同镇边的卫所、屯堡逐步转变为市镇、乡村聚落，具有行政职能的城镇蔚然兴起，农业生产、市镇经济随之得到发展，并为日后成长为商业重镇奠定了基础。明时大同是抵御蒙古部落袭扰的军事重镇，虽一直硝烟不断，但边墙两边蒙汉交往始终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或朝贡，或私市，或互市。入清之后，凭借安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利交通，在继承明大同军镇繁华富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商贸中心。

清前期，延续沿边蒙汉互市的商业贸易轨迹，汉族商人向北不断深入蒙、俄乃至欧洲，北路贸易异常活跃。清廷即在山西杀虎口、山西归化城、直隶张家口、直隶多伦诺尔这四个北方重要商路的必经之地设置海关，征收商品通过税。

杀虎口是清初第一批设立的海关，杀虎口还是山西北部的第一个海关。乾隆二十九年（1774），山西巡抚和其妻奏请开宁鲁口以通商旅，以便民生。“由宁鲁口出入计至左云县仅止五十三里，路极平坦，车辆可通，朝往夕还，于商民甚为便易”，于是在左云县属宁鲁口添设税口，税务仍由杀虎口监督派人征收。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山得胜出口，归杀虎口监督稽征”，经由大同府得胜口、道路平坦，车辆可通行，比经由宁鲁口或杀虎口至丰镇发卖，路途近了许多。

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启了中俄万里茶道的序幕，雍正六年（1728）的《恰克图条约》正式开辟中俄互市，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进驻买卖城与俄商贸易的山西商人已经达到140多家，迎来了晋商万里茶道的成熟期。“万里茶道”南起福建武夷山等产茶区，顺长江，逆水西，过黄河，穿山西北上后，货分两路，一路走西口（今山西西北口），一路走东口（今河北张家口），往北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继而北上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

最后到达贸易重镇——恰克图，从这里转口销往俄罗斯，继而西至欧洲。

大同位于西口和东口的交叉点上，往来“各货多在大同府城聚集”，“马帮、驼帮终年不绝”，货物在这里仓储、分装、打包后，再往西口或东口闯关。仅大同城内的钱铺“竟达三百四十余家”，还有外地驻同会馆即广东会馆、八旗会馆、榆次会馆、湖南会馆四处，各大商帮云集于此。“南关（南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坊。”

大同古城不仅是“万里茶道”上的一个重要市场，也是车队、驼队、马队北上蒙、俄的人畜休整地、货物集散地。毛口袋是旧时商贸马帮队长长途贩运的必备工具，俗称“驮子”。清道光《大同县志》载：“（大同城）其匠艺之最众者，尤有毛毡匠、口袋匠十倍于他处。”这些大量生产的毛口袋，是为过大同古城继而北上草原的商队准备的。

围绕俄蒙市场展开的清代北路贸易，由大同北上主要形成了以下三条相对固定的商路：

第一条：经大同、张家口、乌兰察布、库伦、恰克图至俄国。这是最为便捷的国际商路，山西商人在福建等地贩运茶叶大帮稳定地由这里前往俄国，尤其是恰克图市场兴起之后，这条商道的驼队、马帮运送不绝。

第二条：经大同、杀虎口、归化城通往乌兰察布、伊克昭、阿拉善、额济纳、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伊犁、塔里巴哈台。这是西北方向通往新疆的北通商道。

第三条：经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漠南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喀尔喀蒙古、东臣汗部、土谢图汗部。这是一条通往东北方向的商路。

晋商由大同古城出发经由东口、西口移师北上，开辟了经漠南、漠北直至俄罗斯中心腹地的茶叶贸易之路，大同成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大同“北方商埠”、贸易中心的地位确立。清代大同城车帮、马帮、驼帮终年不绝，是连接蒙、俄的商品集散地，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

活跃了两个多世纪的万里茶道，曾经在地球北部镌刻下一条深深的印记。万里茶道是一条商贸、文化、政治、民俗等共生的商道，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作用。明代大同镇不仅是九边重镇，还是促进晋商兴起的开中制的最早实施地，同时又是蒙古“入贡”必经之道，蒙汉互市贸易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到明朝后期，由于“隆庆议和”后的明蒙互市，大同更是成为了对蒙贸易的集散地和中枢，晋商在此完成了原始积累。清代多一体格局的形成后，大同逐渐完成了从北部军事重镇向区域商贸中心的转化，晋商由大同东去张家口、西出杀虎口，进而北上恰克图，至此大同便成为了万里茶道物资流通的中转站和重要商埠。

（作者系大同市古城保护与修复研究会秘书长）

## 华严寺——大同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

谷敏

著名的大同华严寺，殿宇恢宏，塑像庄严，为历代香火鼎盛四方善众云集之地。它历经千年，几度兴衰，仍保持了较大规模和旺盛的香火。其变化沿革，一方面反映了大同地方兴化的历史变化，一方面也见证了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

### 一、大同华严寺概述

大同华严寺位于大同市古城内西南隅，清街南侧，是一座坐西向东、殿宇巍峨、气势恢宏的辽代皇家佛教寺院，距今已有980多年的历史，依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命名。寺内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中轴线上，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6.6万平方米。大雄宝殿居国内古代寺庙殿宇单体体量之首，薄伽教藏殿是寺内最早的建筑，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殿内雕塑、木构，均为辽代原创，被誉为辽金艺术博物馆。

华严寺是由辽代皇室投资，在旧寺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年）扩建并命名为华严寺。辽金时期，纷争不断，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无法在现实中求得一片安宁乐土，在客观上为宗教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辽代统治者笃信佛教，王室贵族常出资兴建佛教寺院，依佛、崇佛举世闻名。当时最发达的佛学是“华严”，华严寺的扩建命名自然水到渠成。后来“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金代依旧址重建。明宣德、景泰年间又大事重修，补塑佛像，明中叶以后上下两寺各开山门，于是有了上、下华严寺之说。清康熙初年再次对被战火损毁的寺院进行修补，但风光难现。2008年，大同市启动名城复兴工程，依据寺内“金碑”记载，投资对华严寺进行了大规模修整，恢复了辽金时期大华严寺的鼎盛格局，如今已是大同古城内的一颗散发着古韵的明珠。事实上，早在1961年华严寺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的宗教地位也不可

小觑，在辽代时就是奉安帝诸石像、铜像的场所，历史上也一直作为重要道场被使用，到了1983年华严寺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观。

此外，华严寺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作为辽代的皇家寺庙，大同华严寺是有着保有关契丹族原有习惯而建的木构佛寺建筑，其建筑、塑像、壁画、壁藏、平基、藻井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可谓享誉天下。薄伽教藏殿中的“天宫楼阁”独具匠心，气势恢弘，梁思成先生赞誉其为“海内之孤品”。

### 二、华严寺与民族文化融合

大同华严寺作为辽金时期重要的佛教建筑，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华严寺的主要建筑虽在辽朝建成，但每逢战火后都会进行补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在这个建筑群中留下了独特的痕迹，更不必说，华严寺本身就是契丹民族建立的，可以称得上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它的建筑构造、塑像造型、独特的大殿装饰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

华严寺中最明显的具有民族融合特色的地方就在于建筑本身。华严寺的大部分建筑都在辽代建成，辽代是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大同即辽西京，华严寺为西京地区主要的华严宗寺院。华严寺的主要建筑都是坐西朝东，这就是文化碰撞、融合之所产生的。契丹族崇拜太阳，崇日是契丹人最重要的信仰。《新五代史·四夷列传》云：“契丹好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在辽朝无论是吉礼、军仪还是嘉礼，任何朝廷礼仪及重大活动都有拜日之俗。这种原始信仰在华严寺的建筑风格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在华严寺的整体布局中，也存在很多建筑依然保留着传统汉族建筑的布局习惯，如海会殿依然坐北朝南。因此可以看出在建筑上，契丹人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观念，而是与汉族传统风

格得到了融合，甚至于建造时多用居于幽、蓟、并等地的汉人熟练工匠，也使得契丹族的建筑方式更加多元，拥有文化融合的特质。如华严寺大殿的柱网平面和“金厢斗底槽”的形式相近似，内外柱同高，就忠实地反映了辽代契丹建筑风格，用明楹、草墩两套屋架又可看出是承袭了唐代建筑的衣钵。整体建筑在艺术处理上古朴、大气，细节方面不失灵活与细腻。建筑艺术以适用为主，在庙宇装饰上，则趋向于精雕细琢，显得华丽富贵，矛盾中充斥着和谐，这正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后产生的奇妙反应。

其次，大同华严寺的塑像也是民族文化融合集中体现，造像虽有唐代风格的延续，但又明显不同。华严寺中的造像更加注重面部神态，表情丰富生动，衣饰变化丰富而又内敛，华丽却不张扬，人物更具动感，体态各异。造像中最精彩绝伦的是菩萨，最能反映出契丹民族佛教造像整体艺术水平及审美风格。薄伽教藏殿内佛台上，四身较大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面容安详，神态端庄，微含双目，眉若细柳。普贤菩萨戴三叶云头形花冠，观音、地藏、文殊菩萨戴高花宝冠，宝冠饰以缠枝莲花纹、卷草纹、花间穿插有莲和云团造型，整体鎏金，工艺精湛，生动别致。冠上垂下的宝绪缒由耳际顺双肩斜伸于肩及肘处，分段缀出明显的花结，这是辽代菩萨冠常见特征，高冠更是辽朝独有，在当时辽代贵族中较为流行。四大菩萨的造像又凸显出隋唐的风格，腰束长裙、长袍宽袖，裙腰各有两条束带，纹饰叠落有序，自然生动，宽松自然的裙裳继承了中原唐代菩萨造像之特征。而作为众菩萨中身姿最为婀娜的一尊，尤为著名的合掌露齿菩萨，皓齿浅露、合手微笑，体态丰盈，优美婀娜，披天衣，着长裙，潇洒自然，打破了千年来女子“笑不露齿、衣不露体”的成规，使观者无不对契丹民族豪迈不羁的艺术创造力而感叹，这与西方从古希腊就延续下来的

以直白、明晰、奔放的姿态、半裸或全裸的形式展现手法不谋而合。

另外，华严寺的壁画更是不可多得的见证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艺术瑰宝。辽金壁画大多取材于佛教，且多为说法图、本生故事、经变壁画等。其规模都较大，构图中生佛突出，设色以朱砂、青绿为主，间以使用土黄、赭石等色。自古塑绘同源，按照惯例，华严寺在建成之寺内所绘壁画自然以华严经教义为主，然而辽代建的大雄宝殿大部分在兵火中焚毁，但华严宗在金代依然兴盛，与大同临近的五台山是华严经的重要讲经道场，金代的华严寺基本上按照辽代的布局基础，重建了九间殿（即现大雄宝殿和七间殿），又构筑了慈氏菩萨和观音菩萨降魔二阁以及会经楼、钟楼、山门、大殿等。那么，华严经变情节在寺庙中的绘制始于盛唐，盛行于中晚唐，终于宋，可以说是汉民族的独特艺术，如敦煌中晚唐、五代及宋代洞窟中就有绘制此类内容。金在建殿之初，就按普遍流行的佛教华严经的教义和仪规结合本民族的人物特点重新绘制壁画，正是积极与宋在军事、政治上进行较量的同时，又积极吸收汉民族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文化并与之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大雄宝殿的壁画几经战火焚毁，又重新绘制，可以说是辽金以来的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政治、军事上较量，文化宗教上互化或相互影响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资料。

在漫长的民族融合发展历程中，少数民族接续在大同地区建立政权，拓跋鲜卑之北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等等，大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华严寺在这种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中，民族文化交融的色彩大大加强。建筑、塑像、壁画都反映出各民族间的密切联系，正是他们的不断交融、创新，诞生了华严寺这朵佛国世界的奇葩。

（作者系大同市统战事务中心主任 王博副研究员）

在西汉时期，匈奴族利用秦汉更替、中原纷争之际，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凭借30万骑兵的威力，经常骚扰西汉边境地区，破坏生产，掠夺百姓为奴。

### 一、“白登之围”

据《史记》《汉书》《北游录》《皇明经世文编》等史料记载：西汉初年，匈奴族利用秦汉更替、中原纷争之际，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凭借30万骑兵的威力，经常骚扰西汉边境地区，破坏生产，掠夺百姓为奴。公元前201年9月，冒顿单于率兵围攻马邑（今朔州市），韩王信投降匈奴，并与匈奴联合南下攻汉。公元前200年初，刘邦得知匈奴进攻晋阳（今太原市），亲率32万大军迎击匈奴。冒顿单于利用刘邦急于获胜的心理，伪装失利败走，引诱汉兵追赶。在佯败过程中，冒顿单于故意将精骑隐匿，将羸弱之兵暴露在外部，骗得探子回报刘邦相信，遂不顾一切地率领先头部队快速向平城（今大同市）方向追击，和后面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当刘邦到达白登山时，冒顿单于下令10万精锐骑兵设伏将刘邦及先遣队伍团团围住。匈奴骑兵西面是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几次突围未果，被匈奴围困了整整七天七夜。当时正值数九寒天，风雪交加，汉军士兵被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二之三，形势十分危急。这时，随军的户阙侯陈平进献奇计，用厚礼暗中贿赂单于的主妻阏氏，阏氏便向冒顿进言解围。加之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未按约定日期会合，唯恐有诈。又汉军大部队临近，冒顿便听信阏氏之言将包围圈解开一角，汉军才得以脱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 二、和亲融合

汉高祖刘邦从平城归来之后，向建信侯刘敬询问对策。刘敬回答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卒疲劳于连年征战，不可以用武力去征服。冒顿杀死父亲，自立为王，不可用仁义去劝说，只能用计谋使他们的子孙永久称臣”。高帝急切地问有什么好办法，刘敬回答：“如果陛下真能够把大公主嫁给冒顿单于，立为阏氏，生下儿子必定立为太子，将来会继承王位。这样的话，冒顿活着身为女婿，冒顿死了外孙继位单于。每年按时赠送些匈奴稀缺的厚礼，借机向他们说教劝告，不战而使他们屈服”。

汉高祖听了刘敬这个计策，连声称好，遂选取一名宫女冒称大公主嫁

- 给冒顿单于，同时派刘敬去匈奴缔结“和亲盟约”。从此开始，西汉一朝共十二次和亲。分别是：
- 1.高祖七年（前200年），高祖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 2.惠帝三年（前192年），惠帝刘盈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 3.文帝四年（前176年），文帝刘恒以宗女和亲冒顿单于；
  - 4.文帝六年（前174年），文帝以宗女和亲匈奴左单于；
  - 5.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文帝以宗女和亲匈奴右单于；
  - 6.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以宗女和亲匈奴右单于；
  - 7.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以宗女嫁匈奴左单于；
  - 8.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以宗女细君公主和亲乌孙昆弥；
  - 9.太初二年（前103年），武帝以宗女解忧公主和亲乌孙军须靡；
  - 10.地节四年（前66年），宣帝以宫女和亲善国；
  - 11.神爵二年（前60年），汉宣帝以宫女和亲匈奴日逐王；
  - 12.竟宁元年（前33年），元帝以王昭君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

西汉一朝210年，一共有12位公主出塞和亲，为汉匈边境的和平稳定作出了巨大努力。早在秦时，北方匈奴便对中原虎视眈眈，以至于成了边患。由于秦末多年战乱使匈奴成了威胁中原王朝安危的存在。汉高祖刘邦一统中原后，决定征伐以绝后患。然而事与愿违，“白登之围”后，匈奴在草原的威望暴增，强盛气焰达到顶峰。反观汉朝，在经历了连年的征战和自然灾害后，经济衰退，百业荒废，民众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就需要一个大和平稳定的大环境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和亲政策促进了汉匈民族融合，带动双方互通商贸往来，两族平民之间也有了通婚行为。同时，促进了汉匈文化交流，双方分别学习对方文化，将其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由于和亲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中原的平稳和边境的安定，为实现和平发展、恢复经济民生争取到了大量时间，成就了“文景之治”。

### 三、“文景之治”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刘盈继位为惠帝，吕雉为皇太后。前179年，诸吕叛乱平定后，刘恒继位，称汉文帝。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为景帝。文帝、景帝先后统治了39年。这一时期社会相对安定，民众安居乐业，经济趋向繁荣，人口有所增长。

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之政策。汉文帝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还全免田租13年。同时也轻易出兵，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汉文帝生活十分节俭，宫室内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车马不添，帷帐不刺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国家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从而减轻了民户负担。文帝还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他们赏赐，以鼓励耕作的农民。每年春耕时，他还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据《史记·孝景本纪》记载：“中元四年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匈奴入代，与约和亲”。同时，文景二帝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生产迅速发展，国家粮仓丰满，府库殷实，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成为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从版图可以看出，西汉后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辖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50余国。东扩北拓到今江淮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13°。

### 四、几点启示

西汉一朝共计210年，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基本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百业兴旺。由于民族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一体化格局。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文明证实了这一点。《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呼韩邪单于上书文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西汉时期的12次和亲，边关硝烟散尽，茶马互市开通，南北物产交换，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融合，奠定了盛世基础，创造了光辉伟业，成就了“文景盛世”。

（二）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称谓逐步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民族团结、共同御敌，展现出更加鲜明、更加强大的感召力。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归根结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体现的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国情怀。试想，没有西汉时期的和亲政策，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受苦受难的还是人民大众。

（三）民族团结于中华民族生死攸关。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深化民族团结，强化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它对凝合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民族团结，就要落后挨打。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华民族的崛起耿耿于怀，竭尽围追堵截之能事。深化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显得重要。

（四）深化文化认同，同筑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巩固的黏合剂，是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的根本缘由。在多样文化敬重差异、包容多样性实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共生、和谐发展。西汉时期，匈奴国幅员辽阔，蛮夷荒芜，通过民族融合，汉人的农耕文化带入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文化带入关内，两种文化兼收并蓄，起到了发展作用。

（作者系大同长城学会副会长）

## 西汉时期『白登之围』后的民族融合

袁培林